

“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的哲学底蕴

■ 毛 奇

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充分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光辉。首先,它是在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中,解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课题,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理论自觉。其次,它在“面向人民”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向度中,详细阐述了“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价值追求,把西藏工作定义为具有共同主体性的实践活动。复次,它在立足发展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人民性、科学性、发展性、实践性相统一的重要战略思想,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实践总体性意义的理论范导。

关键词:“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哲学底蕴;现实;人民主体;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半个多世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党的边疆治理理论,开创了党的治藏方略崭新境界,形成了“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因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需要破壳而出的,毫无疑问,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觉,是以“实践唯物

主义”为背景语境的。深入挖掘“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的哲学底蕴,对于我们深入把握这一重要战略思想、进而开创西藏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回应现实——在回答时代性问题中体现哲学自觉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②“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不是领导者突发奇想的玄思,不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标新立异,它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其出场语境深深植根于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最现实的状况,亦即是这一状况的意识形态的显现。

当今中国,以3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聚之庞大能量,业已成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新增变量。几家欢喜,几家忧愁。无论怎样粉饰,但始终不可否认,只要反华势力存在一天,这种由中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积累起来的变量,是无论如何也为反华势力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各种形式之于中国的围堵,正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征程中所不可回避的挑战。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分裂中国,在反华势力看来,正是消解这一新增变量的有效途径。因此,以图谋“西藏独立”为目的的各种分裂行径,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而偃旗息鼓,反而一度甚嚣尘上。为摆脱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困境,直面挑战和艰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作为哲学范畴的实践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以其艰涩的辞藻和华丽的外表标明其超越时空的普世和永恒,而是以它立足实践、指导实践、受实践检验的理论张力凸显其伟大和深邃。“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在于它以一针见血的敏锐精准把握了时下社会历史发展最真实的现状,并为我们最终摆脱这一现状中存在的所有困厄和羁绊提供了自身解放的实践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和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背景的“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撇开了以往一切哲学与现实所处的虚幻状态,秉持着批判和革命的精神,牢牢地抓住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着的本质问题和根本矛盾,深刻回答了时代所要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处于关键历史节点、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关键历史时期的重要关头,中央召开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明确了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提出了“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详细阐述了“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人类精神领域拥有无以替代的强大思想力量,正是在于它始终与人类实践保持着绝对清醒的关系。“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在实践的理论孵化中,回答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问题。可以说,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不仅使“治

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得到了全面的阐释,更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直面现实、立足现实、回应现实的哲学自觉。在这一“自觉”中,逻辑和历史得以统一,敦促我们始终在现实中寻找出路。在中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必然崛起与反华势力阻挠中国崛起这二者之间的力量博弈和矛盾运动中,我们锁定了问题的关键,精准定位了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明确把握住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反华势力不是要分化中国吗?那好,我们就针锋相对地把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上来。而要有力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唯有民心所向;于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就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上来。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在实践中抓住了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在对西藏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决矛盾所不可或缺的斗争方式和基本策略,使“实践唯物主义”成为其理论架构中的主导性话语。

二、面向人民——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向度

人民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关怀和价值向度的根本体现。把人民视作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政党的根本性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③,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⑥。毫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页。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定地认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乃是实践的主体,即具有类特性的“现实的个人”。换言之,人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而“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把其价值支撑建构在“人民主体”之上。

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始终是“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的价值追求。在阐释“富民兴藏”时,我们明确指出,就是要把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作为兴藏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让各族群众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在谈到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时,明确指出,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无误地回答了“依靠谁”的问题;在谈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又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服务谁”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具有类特性的“现实的个人”视作历史发展的永恒主体,在实现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的历史存在。“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在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这一永恒的世界历史主题中,一方面继承了我们党半个多世纪以来以“人民主体”为价值支撑的治藏方略,另一方面也创造性地阐明了自身的理论边界和价值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边界,我们找到了“尘世的中心”。这个“尘世的中心”,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能动的、现实的、实践的主体,即具有类特性的“现实的个人”。有了对“尘世的中心”的确认,也就有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范式,才能把历史活动归结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才能把人的主体性放逐到主观能动的创造性视阈中。由此可见,“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

想所涵盖的“人民主体”这一价值向度,不仅强调了具有类特性的“现实的个人”的创造性,从而规避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使科学的实践概念贯穿于“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之中;还强调了“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历史主体性,从而使“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顺理成章地内涵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显性话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个人”的界定,绝不是将其定义为绝对意义上的主体,也绝不是将主体性定义为单个个体的极端独立性和极端自主性。因为,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同时,就已经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②的错误认识纠正过来,撇开了费尔巴哈对“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③的假定,而把人的本质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因此,从“现实的个人”到“人民主体”,其逻辑中自然包含着共同主体性的主旨话语。而“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则充分地涵养了这一主旨话语。无论是“把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作为兴藏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始终把西藏工作定义为具有共同主体性的实践活动,即人民的共同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工作既不能理解为单个个体集合起来的事务组合,更不能理解为是某一群体的特殊事业,而是一个囊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有机的互动的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具有着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三、立足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出发点始终是社会实践本身,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理论,也并非要为人们铺展开一副现实的图景,并不是为具体而现实的社会发展进行纯粹的制度设计,而是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追踪和考察,与时俱进地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①而“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是以关照西藏工作实际为出发点的，始终没有离开包括西藏社会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着的历史，恰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因此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深刻体现，具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在对“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进行全面阐发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也好，还是“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甚或“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其中有个共同点，即指导思想、治藏方略、工作原则，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不仅与60多年来我们党的治边治藏思想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还深刻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深刻回应着当下中华民族欲求实现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应该说，“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从发展着的社会历史中抽象出引领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方略和重要原则，不仅使这些抽象出来的思想、方略、原则以“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为价值追求而适合人民的需要，同时还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现实关照而适合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理论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基本逻辑。就这个意义而言，“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具备着人民性、科学性、发展性、实践性相统一的哲学内涵。

正是有了这样的哲学内涵，“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指导西藏工作也就具有了当代价

值，使得我们能够从总体性意义上去把握西藏工作的具体实践。从总体性意义上去把握西藏工作，我们便能冲破一切与发展着的社会历史相脱离的藩篱，使西藏工作得以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形成良好的系统布局，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纵向把握中建构前后接续的自我扬弃。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的诸多具体表述中，例如在论述“夯实基础”时，我们提出“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又如在论述“长治久安”时，我们提出“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从这个角度来看，“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正是着力从实践的本质要求出发来对西藏工作进行总体性建构，从而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与时俱进的宏观指导，使西藏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 [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 [5]陈俊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观点解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 [6]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作者单位：区党委党校马列教研部
责任编辑：向龙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